

民族志士篇

一曲《正气歌》，一篇《过零丁洋》，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可以说，我们民族的正气，正是以此为标志，沛然于天地间。

众所周知，这些名篇的作者，是伟大的爱国志士文天祥！

而他，也是客家爱国志士杰出代表的第一人——因为宋代，正是客家民系终于得以形成的历史时期。

在文天祥之后，客家人中的民族志士，可谓前仆后继，一一崛起在“多难兴邦”的血泪史上。蔡蒙吉孤城喋血，与文天祥共赴国难。明代威震关外的骁将袁崇焕，是暮色沉沉的晚明中一束火红的霞光，终以生命殉了他镇守北疆的大业。他一死，明朝的边关便不再了，崇祯皇帝可谓自毁长城。郭维经苦守赣州，在烈火中燃尽了最后的生命。刘光第投身变法，成为“六君子”之一，喋血菜市口，人头落地，身子仍屹立不倒……

当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梅州儿女肩上时，梅州的客家人更是表现不俗。

丁日昌，革新鼎故；何如璋，折冲尊俎；黄遵宪不仅是外交家、大诗人，更是湖南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丘逢甲奋起抗击日寇侵台，浑身正气。他们都不愧为民族伟大的斗士！

尤其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淞沪抗战，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黄梅兴、姚子青血战宝山，成为中外闻名的“客家三英烈”……客家人身上的民族正气，就是这么一脉相承，贯通古今的！

文天祥：天地有正气



文天祥（1236—1283年），原名云孙，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今吉州吉安）人。17岁时乡试，名列第一。宋宝祐四年钦点状元及第，咸淳八年，元军大规模南侵，临安告急，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奋起发兵抗元，集赣中、赣南兵，尤其是客家壮丁五万余人，首举勤王义师，被任为江西安抚使兼兵部侍郎，几经曲折，终兵发常州，后又赴临安（今杭州）救驾。

后来，文天祥任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率义兵转战于赣、闽、粤之间，取得于都大捷，收复赣、杏、潮、梅、循诸州，敕封为太保信国公。景炎三年，于广东海丰五岭被俘，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绝唱，以及义薄云天的《正气歌》。1283年元月9日于元大都（今北京）菜市口从容就义，年47岁。

公元1283年，元月初九，距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投海约4年之后，一代名臣文天祥，身戴枷锁，从容不迫地走上菜市口的刑场。文天祥的英名，连大汗忽必烈都为之叹服，倒也不阻挠天下人来为其送行，一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读书人、老百姓，竟堵塞了道路，人流如潮……

人们已经读到了他的《过零丁洋》，也读到了他的《正气歌》，深为他的浩然正气、崇高人格所折服。

无疑，从容赴死，是他早已作出的选择，他在《过零丁洋》一诗中，便披肝沥胆，吟出了千古绝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辉煌。他把被砍下的头颅，放在了历史的天平上，令一切苟且偷生又百般狡辩者，从此失去了重量。

多少人想留下他的生命——毕竟，生命是宝贵的，甚至连敌方的大汗，像忽必烈，对文天祥就心仪已久，因为当时有一句名言，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前者，是辅助两位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的开国名臣，所以，忽必烈也想用文天祥为宰相，而归附元朝。最终灭宋的将领张弘范，在临死前也向忽必烈奏表，说文天祥忠君爱国，应该放而不可杀，否则，不能收天下之心，以稳定元朝的政权。

还有很多炙手可热的权贵，也想借用文天祥的英名。

但是，文天祥给他们的回答，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在这首长诗中，他以历史上众多堪为典范的民族义士为例，抒发了他壮怀激烈的爱国之情，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不能自己！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凜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何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正是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激励他度过狱中的非人岁月，在回顾了不堪忍受的折磨后，他豪壮地宣布：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今天，正是他实践“古道照颜色”“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刻了！

也许，当时很多人，都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为由，纷纷归附元朝，甚至位尊为宰相、大将军。的确，宋王朝气数已尽，在沉船上同归于尽未必英明，更何况连皇帝都投降了呢！你不是“忠君”么，为何不降？

但文天祥却凛凛然地作出了回答：

“社稷为重 君为轻！”

“君降 我不降！”

那么，他是忠于什么呢？

我想，他忠于的是华夏那源远流长的文化，这一文化已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这一文化所展示的理想人格……从《正气歌》中，“风檐展书读”是几千年的历史正气，人格清流，正是这一正气，这一清流，才有唐强宋富这样的华夏文明之巅峰，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荣光。而自元朝始，这一文明也就走了下坡路，被截断了，而后，是近八百年屈辱、落后与挨打。

也许，他不曾预见到这七八百年，可他分明是感觉到了——直到今天，连历史学家也称，宋亡，有如华夏文明的“滑铁卢之役”，随后，便是元、明、清的禁海、文字狱，乃至……屠城！他能不为之痛心疾首么？

他要以自己的头颅、冲天的血，去昭示人们，去昭示历史！

可以说，他是客家第一人！

他身上的正气、骨气乃至傲气，自他之后，就在客家人身上一脉相承、毁家纾难。客家人就自他开始，一直到袁崇焕、郭维经，一直到刘光第、黄遵宪，一直到孙中山、邓演达，一直到朱德、叶剑英。客家民系形成之初，就有这么一位黄钟大吕的人物傲然挺立，是客家人的大幸，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没有这种民族英雄献身精神的传承，又怎有日后扭转乾坤、再造中华之功？！

我们从元人一次又一次的劝降中，读到的正是文天祥身上的文化之力、人格之光——

被视为“滑铁卢之役”的厓门战事后，元都统元帅张弘范，在广州的庆功会上，再一次对文天祥劝降，因为这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已经沉海，一个皇朝也就不再了，他以为，文天祥的尽忠，已经没了对象。

于是，他对文天祥说：“国家都已亡了，作为忠臣，你的忠臣之事也都一齐结束了。你杀身成忠孝之名，有谁为你表彰呢？如果文丞

相改心易虑，就像忠于大宋一样为大元效忠，那么，大元贤相，非你莫属了！”

文天祥一脸正气，回答道：“国亡尚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岂敢逃避死亡，存有二心呢？我从未听说，因存心而改变心迹的。”

张弘范又说：“国家已亡，你死了有谁来表彰？”

文天祥正色道：“商亡，夷齐不食周粟，不过是尽心罢了，哪管什么表彰不表彰呢？”

张弘范无计可施，只好不再劝了，而且对部下说：“杀了他，正好成全了他的美名；不杀他，以客礼相待，我们反会落个宽仁的好名声。”

他作为降将，位尊至都统元帅是这么想的，而宰相、大汗，也都曾这么考虑。所以，元相孛罗，也下令“善待”文天祥。在把文天祥押到大都后，他将文天祥请到了一个奢华的房间，送上了可口的美食，视为上宾。

但文天祥岿然不动。

头一个登场劝降者，是原南宋丞相留梦炎，他同文天祥一样，都是状元宰相，只是在临安告急时为保命出逃，后来投了降，当上了元朝的礼部尚书。

文天祥一见他，便破口大骂，骂得他无地自容，狼狈而去。

第二个劝降的，竟是亡国之君，宋恭帝赵昀。孛罗当是这么考虑的，文天祥是以忠君爱国著称的，现在，让投降了的皇帝来劝你，你该怎么“忠”法？

谁知，文天祥一见这亡国之君，悲愤交加，迭声道：“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说得赵昀一脸羞愧，连忙告退。

于是，元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只好亲自出马了。

他开口便问：“知道我是谁吗？”

文天祥说：“听说是宰相来了。”

阿合马厉声道：“既然知是宰相，为何不跪？”

文天祥一扬首：“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何要跪？”

阿合马冷笑道：“那你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文天祥正色道：“南朝如果早用我为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到北方。”

阿合马又说：“你的生死，捏在我手心。”

文天祥挺直腰说：“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你不由你！”

阿合马退下阵来，立即将文天祥戴枷重锁，投进大狱，以消磨他的意志。一个多月后，丞相孛罗终于出马了，亲自在枢密院审问文天祥。

先来一番下马威：“跪下！”

文天祥却答：“南人只行南礼，不跪！”

孛罗令左右下死力，强迫文天祥下跪，可文天祥始终不肯就范，最后，只是拽坐在地。

孛罗想攻破文天祥的思想防线，说：“你丢弃嗣君——德祐赵昰，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

文天祥理直气壮：“社稷为重，君为轻。”

“那你立了二王，又干出了什么功绩？”

“我立二王，是要保住宋室宗庙，活一天就得尽一天臣子之责，不谈功绩。”文天祥如是说。

孛罗厉声道：“你既然知道徒劳无功，那又何必去做呢？”

文天祥却说：“臣子事君，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父亲不幸重病，虽然明明知道治不好了，但又怎么能不求医下药呢？”他振声道：“今天，我文天祥已经到了这里，惟有一死，有什么可说的？”

孛罗恼怒之极，呵斥道：“你要死，我偏不让你快死，把你关起来！”

文天祥一笑置之：“死都不怕，还怕关吗？”

从此，狱中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劣，冬天严寒砭骨，夏季溽热如蒸，老鼠横行，跳蚤遍处。可他在《正气歌》中仍写道：

阴房闼鬼大，春院闼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诊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

这种折磨，不足以夺其志！

在肉体、精神的折磨都无以复加之际，终于，元世祖忽必烈出场了。

1283年正月初八，文天祥被带上了金銮殿。元世祖想最后降伏

文天祥，好用他为丞相。但上了金殿，文天祥纵然一身伤残，尤其是被金挝打伤了膝盖，也决不跪拜，傲立庭中。

忽必烈长叹一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文天祥铮铮傲骨，答道：“我大宋太祖、太宗，以尧舜之道一统天下，治国安邦，有口皆碑。上无不道之臣，下无须救助之民。而你们北朝，一个远僻一隅的国家，凭借军马之武力，兴无名之师，侵我疆土，残我生灵，毁我宗社，灭我大宋三百年宗庙。我身为大宋丞相，自然要尽心竭力，匡扶宋室，谁料奸臣误国，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没能扶助宋室，反而被擒辱，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宋亡了，我但求速死，决不苟且偷生！”

忽必烈仍劝说道：“如果你事元如事宋，我立即任命你当丞相。”

文天祥说：“我文天祥身为宋朝状元宰相，宋已亡，我惟有一死，不愿偷生。”

忽必烈还在劝：“不做宰相，也可以做枢密嘛。”

文天祥一句话，掷地可作金玉之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知道已经没法劝降了，于是说：“文天祥既不愿投降，那就成全他吧，接受他的请求，赐他一死。”

于是，第二天，文天祥被押赴刑场。

人潮如海，人们大多是敬仰文天祥的气节而来，当为他壮行。

监斩官还想作最后的努力，在临刑前问道：“丞相还有什么话说吗？有的话，我当即回奏，还可以免你一死。”

文天祥振声道：“死即死，没什么可说的。”而后，问监斩官：“哪一边是南方？”

监斩官不答。

却有人指了出来：“那边。”

文天祥转了身，面对南方——自己的故乡、故国，深深地拜了两拜。

而后，讲了后人视为名言的一句话：

“吾事已毕，心无忤矣。”

从容引颈就义。

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间，找到了他早已写成的遗书，字字皆血：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亡

机，谨南向百拜而死。

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是年，47岁。

每种文化，对于生与死的诠释，可能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支柱，失去了这一支柱，民族与国家也就不再存在了。于是，生与死，在这一精神支柱上，就有着异乎寻常的分量。文天祥选择的不仅仅是死，而是——活，维系这一精神之不死！

也就在他从容就义之后仅80年，短命的元朝便一朝倾覆了。

而在他就义前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在他就义后七八百年间，与整个民族一道，力挽狂澜，重新让华夏文明振兴了起来！

一曲《正气歌》，当比一个人的生命，要长千百倍，直至永远！

袁崇焕：一夫当关



袁崇焕（1584—1630年），广东东莞水南村人，出生于广西藤县，明万历进士，天启二年提任兵部主事。时值明末，北疆屡遭后金（清）侵袭，袁崇焕临危受命，统帅抗敌，1626年宁远大捷，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重伤不治。1627年又获宁锦大捷，大败努尔哈赤继任者皇太极。但袁崇焕却备受几任皇帝的猜忌，虽官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1630年，竟遭诬陷，被极刑至死，明朝也从此加速了灭亡。

明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经济实力从此由强盛趋向贫弱，中国的视界从此由开阔日益走向内敛。

万历十年，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20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25年不上

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不幸的黑暗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以摧枯拉朽之势成为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就惨败一场，仅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让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4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13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自己还在战斗中被打伤。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惨败的滋味让他羞愧难当，不久就在痛恨中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欲雪此恨、为父报仇的皇太极，怀“灭此朝食”之志，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多日，然而攻城不下、野战不克，却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风丧胆。

袁崇焕，广东东莞县客家人，生于战乱之际的他，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在幼年之时，他就胆识超凡、慷慨任气，喜好谈兵，每每有老校退卒，就时常跟随左右，帮助他们做些小事，借机详细询问边事、请教边情。当然，他这可不只是出于一般少年对战斗的好奇之心，而是在作了详细的记录后，借助实际的战例深入研究兵书战法、地图舆册，洞明厄塞情形、通晓攻守智略，以急国家之急。

万历四十七年，他中进士后，被派到福建邵武去任知县。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平日很是喜欢高谈阔论的他，对于边疆的战局情势，大发议论。大概是在和友人谈话时，发表的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有见地，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了他。于是他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没多久，广宁之战爆发，王化贞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战报传来，举国沸腾，朝廷震惊。皇帝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山海关守备事宜。然而，关外局势到底如何，却谣言满天飞，真假难辨。从朝堂到街衢，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不是一片坐以待毙之态，就是到处嚶嚶嗡嗡之声。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4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长驱直入，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怎么守？谁都不敢保证万无一失。山海关

一失，清兵可就长驱直捣北京了。

未雨绸缪已久，早有所备的崇焕明察秋毫，对战局洞若观火，面对危局他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心中已经有条清晰的思路，对付满兵“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他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他的豪言壮语让朝廷上下人心大定，他的胆识谋略给人印象深刻，赢得了朝廷的支持，升任他兵备金事，被派去助守山海关。有此用武之地，他雄心勃勃地上了前线，一展他的抱负。“杖策必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博取侯封，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危难为己任。任事干练的他，很被王在晋倚重，不久就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金事（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然而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不能听取他的建议，在离山海关较远的宁远设城，以屏障山海关。直到大学士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真正开始。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袁崇焕到后，立即整饬军纪，蓄积战斗力；同时广泛宣扬宁远的战略意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 3 丈 2 尺，城雉再高 6 尺，城墙墙址广 3 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宁远城一筑成，把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 21 年之久。

宁远这枚牢靠的钉子已经扎牢，整个战局就大不相同了。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鸣警到东巡广宁，军事上已经从守势转为攻势。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形势大好。清兵见明将士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推进，4 年之中再也不敢轻易来犯。然而，终究贼心不死，枕戈待旦，积极准备进攻，努尔

哈赤更是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随时南下攻明，西取蒙古。

天启五年，魏忠贤专权，排斥异己，用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以不可理喻的撤退断送了几年苦苦积累下来的决战的资本。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逐一撤去。撤退的混乱，造成难民载道，哭声震野。抚摸着自已亲手筑就的宽厚的城墙，袁崇焕的心在流血，国家民族的重任更需要他来担当。他抗命不听了：“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地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宁远又成了一座孤城，傲然挺立在广漠的前线上。

如此草包的统帅，袁崇焕无人支持。得此良机，满清自然不会放过，他们应该笑得合不拢嘴吧。

天启六年正月满清13万大军大举渡过辽河，进攻宁远，志在必得。袁崇焕临危不惧，首先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接着召开誓师大会，他与诸将歃血祭天；并且自己当众刺血为书，写成文告，军民传阅，激以忠义，誓与宁远共存亡。在探明劲敌动向后，面对城中只有一万守军的情况，采用坚壁清野战术，动员城外百姓撤进城内，烧毁城外建筑，使宁远城四周一片空旷。伫立旌旗招展的城头，坚毅地眺望着远方腾腾的黑烟，袁崇焕曾有的幻象成为了现实。他预先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热血沸腾，期待着敌人的到来。

挟久蓄之威，后金急不可耐地向宁远城发起疯狂猛攻。一辆辆铁裹车轰隆轰隆，猛撞城墙，势道惊人；一架架云梯，呼啦啦的搭上城墙。箭矢如雨，喊杀声，爆炸声，惊天动地。其时适逢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忽听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韩瑗大惊，吓得低头不起。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渐渐地战斗进入白热化，袁崇焕登城指挥，用弓箭、石头击毙攻城的后金兵，再用红衣大炮向远处敌人开炮，后金兵死伤无数，损失惨重。但是敌人仗着人多，攻势不减，城墙被撞垮一丈多，袁崇焕亲自搬石去堵塞缺口，连中两箭，所幸未及要害。部将死死拽住他，不让再冒生命危险，他厉声道：“宁远虽小，但攸关中国存亡。宁远失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鞑子的奴隶

了。”甩手撕下战袍来裹住伤口，又冲进了箭雨之中。将士受其感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很快又堵上了缺口。25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师死战，打伤清太祖努尔哈赤。血战三日，后金兵损失惨重，被大炮击伤的努尔哈赤，仓皇退兵。袁崇焕不失战机，乘胜出城追敌30余里，歼敌一万余人，取得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败回沈阳，叹道：“我自25岁征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小小宁远一城不下。”忧愤交加，半年后，努尔哈赤去世。

捷报传到京都，满朝文武惊喜异常。都以为宁远必失，袁崇焕必死，但是经过一场恶战，宁远城岿然屹立，明军取得与后金交战8年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士气大振。

接下来的明朝，如同打摆子的病人，时好时坏。袁崇焕曾经上了一道极具重要性的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为用辽人守辽土；二为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是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这一主张彻底改变了战局。但是他最担心的事，是立功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自己生死事小，国家因此而遭难则事大了。诚如所料，在几次起伏沉浮之间，袁崇焕在战场上站定脚跟，取得了胜利，却因明朝皇帝中满人的反间计，竟被己方所擒，在刑场上招来了凌迟之刑。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他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而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由于袁崇焕一死，明军失去一位坚强统帅，清兵长驱直入，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千古奇冤，只因上昏下愚！

郭维经：烈火中永生

郭维经，（1588—1648年），字六修，号云机。江西遂川人，天启年进士。明末的干臣，抗清的志士。南明王朝，任吏、兵二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与清军大战于赣州—南安一线，率部八千，血战赣州城下。城破不降，于嵯峨寺自焚尽忠。乾隆四十三年，被追谥为“忠烈”。

郭维经，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生于今江西五斗江乡五斗江村的三溪。

“五斗”两字，给人联翩的遐想，此江名叫蜀水，怎么流到了此地竟然以“五斗”为名？难道是东晋清高绝尘的大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令这条河倾倒了么？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在此地似乎得改为见“西山”更合适些。然而，生于兹长于兹的郭维经，纵观其一生所为，他却并没有秉承这一“高风亮节”，始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投身朝堂之上为民请愿“英毅敢言”，直到生命的尽头。最后在兵败于督师援赣州抗清的战役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自焚于赣州嵯峨寺，让自己化成了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

明天启四年（1624年）郭维经中举人，天启五年中进士，时年38岁。开始被授官行人，崇祯三年（1630年）升任南京御史。深感朝廷政治的腐败，心怀苦难深重的人民，不畏皇权“天威”，敢于屡次上书抨击时弊，甚至直接“刺帝”。史称他“疏称时弊，中有所举刺。……帝切责之”。

当时，崇祯朝廷的大权，全部掌握在周延儒手中，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他的家人周文郁平庸无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擢升为副总兵。如此荒唐，简直是视国家军政为儿戏，将国家大事当家事。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周延儒更是不择手段，排除异己。郭维经清晰地记得：刘宗周，崇祯元年时为顺天府尹的这个意志精纯的热血汉子，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性格刚烈，眼里容不下半点儿沙子。上任伊始，便上疏指出崇祯帝“求治之心，操之太急”。崇祯五年，更进“进祈天永命之说”，他写道：“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持简，亦愿体一人始生之心，毋驱除异己，鞫朝士以大狱，结国家册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异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当时读之，真是字字珠玑深中肯綮，句句直破奸邪佞臣之胆，其忠肝义胆，令天下之人肝胆奋张。周延儒、温体仁见后吓得发抖，体若筛糠。当时正在祈雨，刘宗周自称患病，

周延儒狗急跳墙“指为偃蹇”，激起崇祯帝的怒火。昏君朱由检果然“拟旨诘之”，命令刘宗周陈述人才的状况及使兵饷充足的办法，幸亏刘宗周心怀国家大计，胸有成竹，从容“条画以对”，才粉碎了两人的阴谋。

周延儒政治上玩弄权术，生活上腐化堕落，秽行丑闻，几乎天下大白、人所共知。郭维经曾经连上两本，弹劾这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罪人，但皇帝对此都视而不见、不屑一顾，只是从自己心中对结党的厌恶与恐惧出发，一味地认为弹劾周的人越多，周在朝中便越孤立，就越不可能结党营私，却反而更加庇护周延儒。

念及此时，郭维经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斜斜西沉的冷月在眼前闪耀着寒光，他痛苦地牵动了自己脸部冻得发僵的神经，挤出一丝笑容。世道如此，只能自己作最后一搏了。他慢慢地转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挑亮了早已放在书桌上的油灯，火焰顿时大放光华，照得陋室暖烘烘的。他搓了搓冰凉的双手，活络活络手指，又朝几近冻上的砚台呵了口气，缓缓拈起狼毫，饱蘸浓墨，在早已铺好的宣纸上，酣畅淋漓地写道：“……愿斩延儒以谢天下，复斩臣头以谢延儒。……”笔不加点、一气呵成，望着面前湿漉漉的墨字，看着自己吃了熊心豹胆掏出一颗心，郭维经的额头上汗迹斑斑，在摇曳的灯光下，亮晶晶地一闪一闪。

东边的天空渐渐泛白，已透出了曙光，刚刚卧了一卧的郭维经拍了拍自己松弛的面颊，拂开薄被，起身上朝。可以想见，在昏庸的皇帝见到这份奏折时，该是多么的震惊啊！颤抖的双手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慌，所有的恐惧都在脸上炸开了。天阶之下，死寂一片，大臣们看着自家皇帝的脸色如开酱铺，五颜六色变化不定，都吓得大气不敢出，纷纷勾紧自己的头，贴在自己的胸部，好让自己的心清楚知道自己的头还好好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哈哈，哈哈哈”一阵大笑打破了沉寂，群臣慌忙暗地里找那个不知好歹自寻死路的家伙，心想这家伙死定了，皇上杀了这个人，应该能解开愤怒了吧！却见皇帝正手持奏折望着他们，不由得胸口又是一阵揪心的痛。哪知狠狠扔下一份奏折后，皇帝的笑声渐渐低落，趋于平和了，面色也渐渐松弛了，声音正常了，不再似刚才那般恐怖森然。朝堂里的气氛才重新活跃了一些。

郭维经知道自己今天是闯下了大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傲然

挺立。却见皇帝在大笑过后，反而平静了，不免纳闷不已。然而接下来的庭议，皇帝的虚与委蛇让他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原来鉴于大家都对周延儒不满，皇上是怕自己作出过分之举，激起公愤，于己不利，才在愤怒的狂笑中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免了自己的杀身之祸。

散朝归来，郭维经步履蹒跚，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今上软硬不吃，如此不闻不问，国家该如何是好啊？但是他的忧心似乎成为了多余，在他的乞死强谏之下，在群臣的不懈努力下，更是在温体仁的阴谋策划下，崇祯六年秋，皇帝终于废除了周延儒。

但是，接替辅政的温体仁，乃周之一党，欢喜之中，郭维经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时时注意搜集他的劣迹罪证。时间日久，劣迹昭彰，维经再一次不顾身家性命、个人安危上书弹劾：“执政不患无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筹国事。国事日非，则委日我不知，坐视盗贼日猖，边境日急，止与二三小臣争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几成聚讼，可谓有才邪？”然而，皇帝终是不听，没有再‘姑息’他，龙颜大怒，狠狠地责罚了一番，削去官职，打回原籍。

崇祯十六年（1643年），皇帝清醒了一回，为了自己统治的苟延残喘，召回了忠心耿耿的郭维经。崇祯十七年（1644年，顺治元年），崇祯皇帝死后，福王升郭维经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顺治二年，唐王朱聿键又升郭维经为吏部尚书，加大学士，并且“眷顾特隆”，咨以大小政事。然而，明朝已经腐朽透顶了，郭维经独木难支，在清兵的大举进攻中，后明节节败退。顺治三年，清兵攻破吉安，团团围住了赣州。五月，唐王加郭维经太子大保、吏兵二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五省军务，命郭维经率兵援赣。为了守住赣州，郭维经同御史姚奇允积极招募了兵勇8千人开进赣州，与尚书杨廷麟、巡抚万元吉共同防守，他们齐心协力，制定了周密的城防计划，布置兵勇，严防死守，对抗着清兵的狂攻猛打，没有给清兵任何可乘之机。然而苦守两个月后，到了八月，清兵改变了策略，派水师乘夜突袭，截江焚毁了大批船只，杀死杀伤大批明兵，明军的火药、兵器损失殆尽。接着又传来噩耗，唐王在汀州兵败被清兵抓获，群龙无首，将士伤心欲绝，士兵更加震恐，局势愈发不可收拾了。十月初四，清兵乘着浓重的夜色，在朦胧难辨人形的水雾掩护下，悄悄登上城头。伤心疲惫至极的守军，在如狼似虎的清兵的欢呼和喊杀声中，丧失了他们惟一可以一搏的屏障。

失败已成定局，大势不可挽回，郭维经提着剑，坚定地步入嵯峨寺，点燃了早已预备好的柴堆，自焚而死，时年 59 岁。同他相伴一生的利剑，在烈焰中化为了钢水，但是不变的是它的坚韧，在冷却后，它又会绽放自己夺目的光芒。

刘光第：维新志士



刘光第（1859—1898 年），字裴村，四川富顺县人，著名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

刘光第经历了家境优裕到贫穷的变故，他从小刻苦读书，立志成才，21 岁时，刘光第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中秀才，24 岁时在殿试中表现突出，考中进士，官授刑部主事。1898 年，刘光第参与筹建蜀学会，康有为在粤东会馆开保国会的时候，刘光第曾出席参加，并因此积极参与戊戌变法。

同年 7 月，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加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8 月，慈禧发起宫廷政变，刘光第等 6 人被捕，并于 8 月 13 日英勇就义。

一、清贫不坠志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刘光第服丧期满，在亲朋好友的多方劝说之下，携上妻儿，登上了往赴京师的旅程，此时的刘光第虽然仍有故土留恋之情，但展望未来，瞻念前程，他还是满怀豪情壮志，迫切地渴望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国为民造福。

刘光第到达京师，安顿好家小，便到刑部销假，然后，又到吏部“起服”。原来清朝律例有规定，凡是官员回原籍“守制”的，一律在守制期满后列入候补之席，而不能官复原职。刘光第在守制之前是刑部主事，4 年之后再回到京师，却只能得到一个刑部的“候补主事”，

更为尴尬的是，在这个低位上，他一做就是 10 年。

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刘光第的俸禄实在少得可怜，正值国家多难，朝野不安之际，市面上的柴米油盐天天见涨，可以想像，他的生活会陷入何等的窘状。

刘光第在生活上处处节俭，他的家人也都仿效其生活方式，决不敢有半点奢侈，纵然这样，这个为官之家的贫困在当时的京官里还是成为了谈资。

别的官员去衙门办公，总是或乘车，或坐轿，刘光第哪里有余钱买车，也不可能白白养着几个轿夫，他只能步行，每逢下雨天气，地上泥泞甚多，他的官袍下摆总是溅上斑斑点点的泥迹，偶有衣着光鲜的同僚以此取笑，刘光第却颇不以为然，丝毫不觉得贫穷是丢脸的事情。

实际上，即使是这件被泥水弄脏的袍子，他也十分爱惜，回到家里，让夫人清洗干净，第二天穿着照常出门，就这样，一件袍子他居然穿了 10 年，陪他度过了整个“候补主事”的历程。平日里，刘光第的居家衣服更是简陋，都是粗布衣服，而他的孩子总是破衣烂裤，竟至于被人误会为乞儿，刘光第的妻子深知丈夫的为官之难，她的衣服比官宦人家仆役都不如。

京城虽然繁华，实在不易居住，更难以久居，刘光第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一家平日里总是粗茶淡饭，有时候，市面上米价突涨，刘光第的妻子常常只能买些糙米、老米甚至是番薯之类的杂食回家，让一家人不至于饿肚子。即便这样，吃不饱的情形还是时有发生，刘光第索性自己动手，在宅院的前前后后开垦出若干片小豆腐块似的菜地，种上各种蔬菜瓜果，遇上家中没有余钱买粮的时候，这些瓜果蔬菜就成了一家人的“救命草”了。好笑的是，有一次，一个亲戚要在京城逗留数日，住在刘光第的家中，实在受不了每天的菜肴只是几碟蔬菜，竟然自己在外边买了肉回来独食。

刘光第简朴得甚至有些寒碜的家居生活情况传到了他的家乡四川富顺赵化镇，引来其堂弟的来信询问，问是否需要资助，京城里也有一些人看不过他一家的清苦，吐露救济之意，刘光第一概不接受。从小就在苦水里泡着长大的刘光第，并没有因为家境贫寒而烦恼忧愁，他怡然自乐地参加体力劳动，还常常以诗自娱。他认为，虽然收入微薄需要他生活处处简单化，但节俭更是他从小的习惯，是他自觉的行为，他更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倡导节俭这种美德，改良社会风气。